

中国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思想述论 (1956—1966年)

刘 仓

[摘要]反对官僚主义是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方面。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集体,当官做老爷,违反党的群众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官僚主义会危及群众的利益、党的执政地位、国家的事业和民族的前途。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思想在党员干部中的反映,同党的性质、宗旨、使命背道而驰。反对官僚主义,应加强和健全党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改革党和政府机构,加强党内、党外监督,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由于党执政时间较短,民主制度建设经验较少,反对官僚主义也存在重运动、轻机制,重教育、轻制度,重政策、轻法治,重综合、轻细化等缺憾。反对官僚主义是党要管党、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有益尝试,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财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官僚主义;党要管党;历史经验;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7)03-0077-07

反对官僚主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执政党建设的课题之一。中共十八大以来,在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和“两学一做”教育等党建活动中,都包含反对官僚主义的内容。研究中共八大至“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时期党反对官僚主义的历史,^①梳理反对官僚主义的历史脉络和基本思想,可以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历史借鉴。

一、反对官僚主义是新形势下党面临的历史课题

在不同历史阶段,围绕不同中心任务,反对官僚主义也会呈现不同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从局部执政转变为执掌全国政权。党和毛泽东号召坚持“两个务必”,以“三反”运动为载体,反对党政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与革命时期相比,官僚主义会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反对官僚主义也会有新的方式。

中国社会方位和党的历史方位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逐渐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社会生产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也从政治革命转变为现代化建设。党从夺取政权到执掌全国政权,意味着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发生转变。马克思主义者要掌好权,不要被资产阶级拿走。但是,掌握政权,要谨慎;使用政权,更

要慎重。如果有权就为所欲为,那非把事情弄坏不可。这也是滋长官僚主义的政治原因。周恩来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1〕}(p.418)

执政党掌权有两种态度:一是做官,一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如果做人民的勤务员,就应该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然而,执政做官的条件具备,最容易沾染官气。执政党的地位会使党员干部改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但也可能会出现消极变化,在党和国家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中,滋长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共产党在革命和局部执政时期,面临生死的考验,容易和群众团结奋斗;当成为国家权力的执掌者,生死危险基本解除,一些党员干部就容易以领导者、统治者自居,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他们不搞调查研究,不了解实情,不从群众需要和客观条件来考虑问题,而是凭主观臆断。他们满足于做决议、发指示、送文件,不了解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对于群众生活漠不关心。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严重妨碍国家民主生活,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前进。邓小平说:“根本问题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问题。干部做官了,官做大了,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了,能解决的问题也不解决。”^{〔2〕}(p.85)

执政党的地位,会使“打天下、坐天下”的腐朽观念沉渣泛起。政治革命成功后,一些党员干部阶级意识减弱,使命责任意识淡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却上升。他们居功自傲,脱离群众、奢侈浪费、贪污腐败、蜕化变质;为人民服务精神减少,争名誉、争地位、争权力、争利益的观点加重。因此,防止党政干部形成官僚特权阶

作者:刘仓,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学术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思想的研究成果较多,涉及官僚主义的根源、实质、表现、危害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主要措施。而从历史学角度梳理中共八大至“文革”发生前中国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的研究成果,则较少。本文借鉴已有成果的研究框架和主要思路,突出这一时期反对官僚主义的阶段性特征。

层,防止人民公仆变成人民主人,是反对官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必然发展为主观主义,具体表现为教条主义或者经验主义;而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则是狭隘宗派主义倾向,是脱离群众的最危险倾向。必须把反对官僚主义,同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相结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指出,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外团结,阻碍事业前进,阻碍同志进步。必须加强党内思想教育,克服这些严重缺点。^{[3](p.116)}

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治体制,因存在诸多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会产生官僚主义弊病。执政党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党的组织分布到每一个城镇、县区、重要企业和各个民族。一些党员干部在各级国家机关、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中担负一定工作。这样造成党、政、群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助长官僚主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建议对党政机构进行精简。^{[3](p.36)}

集中统一的国家管理体制,也存在官僚主义弊病。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和巩固国家统一,把中央管理的事务集中到中央手中,这是反对分散主义的需要,但也容易造成中央有些部门事务集中,对地方限制过多,忽视地方特殊情况,应当同地方商量的事也不同地方商量等。有些部门滥发公文和表格,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这样,既不利于地方的工作,也分散了中央的精力,发展了官僚主义。

可见,在新阶段新形势下,反对官僚主义,是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保持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防止腐化变质的需要,是改革和完善党政机构的需要,是扩大党内民主、发扬人民民主的需要,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需要。

二、反对官僚主义的主要历程

从中共八大到“文化大革命”前,党反对官僚主义,大致呈现三个阶段。

(一)通过建章立制、整顿作风反对官僚主义

中共八大开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对官僚主义的新历程。1956年9月,中共八大把扩大民主生活、反对官僚主义,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任务。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强调在人民民主制度下逐步消除官僚主义病害,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的几项措施:针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提出改善国家机关,精简组织机构,明确工作人员职责,规定中央、省市领导负责人员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职责;针对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提出要对国家工作进行监督,包括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中央政府机关的监督,加强地方各级人大对各级政府的监督,加强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加强

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国家机关的监督,加强中央和地方的互相监督;针对中央包揽各种事务的官僚主义,提出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职权,中央负责提出一般的方针政策和大的规划,具体工作交由地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去部署办理,省、市、县、乡都应当有一定范围的行政管理职权。这符合扩大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的要求。^{[4](pp.75-76)}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的六项措施: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加强对党和国家的监督工作;定期整顿党的工作作风,检查群众路线执行情况;密切与党外人士合作,监督党员的工作。^{[5](pp.223-225)}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载入反对官僚主义的条款。这些也是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有益尝试。

借鉴延安整风经验反对官僚主义是党的重要选择。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倾向作斗争。^{[6](p.247)}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遗憾的是,这次整风运动很快转入反右派斗争。

党的干部制度和机构调整带来官僚主义问题。在农村合作化高潮中,撤区并乡,大量的区级干部充实乡级政权,导致乡级机构臃肿,产生机构大、编制多、文件报表多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问题。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非生产的工作人员过多,助长官僚主义的发展。1957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今后干部工作方法的的通知》,要求按照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停止增设机构和扩大编制的通知,一律停止增设机构和增加人员。所有企业、事业机关的非生产人员必须严格地加以限制。^{[7](p.92)}

在经济建设中,某些领导干部存在铺张浪费、贪污盗窃等违法乱纪行为。1956年12月,根据中共八大和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第六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提出,各级国家监察机关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反对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作风,坚决向铺张浪费、贪污盗窃、违法乱纪等行为作斗争。

为配合超英赶美战略,推进生产跃进高潮,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要求抓紧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这条纲,把整风运动和生产工作统一起来,揭露一些干部思想作风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害,迅速打掉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和娇气。^{[8](pp.137-138)}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要求领导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3](p.378)}

(二)通过综合施治、多管齐下反对官僚主义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刮起来;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滋长蔓延,损害人民群众利益。1960年3月30日,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强调利用六级和四级干部大会,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简称农村“三反”运动)的任务,并把官僚主义概括

为“五多五少”。^①

196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初步检查中央各部委、中央一级国家机关各单位严重的“五多”现象,特别是会议多,文件、表报多等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现象。党和国家机关反官僚主义运动全面展开。5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在中央国家机关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7月14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11个省、市委监委副书记座谈会,总结农村“三反”运动情况,讨论研究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中央和地方的互动,形成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模式。各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总结经验;中共中央就各地反对官僚主义情况,及时发出指示,指导运动。例如,根据四川省委检查“五多”情况,中央总结出反对官僚主义的若干重要措施: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建立和健全必要的制度;认真精简机构,紧缩编制,充实基层,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公社和管理区干部,生产队的干部,应经常参加劳动;等等。^{[9](p.477-478)}

为克服经济困难,通过精简机构反对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1960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关于中央各部门机构编制情况和精简意见的报告》,此后,中央各部门精简编制。1962年2月,中央精简小组提出《关于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提出全国国家机关原有职工268万余人,拟减为174万余人,精简94万余人,占原有人数的35%。^{[10](p.102)}2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个建议。但是,由于中央一级新建一些机构,导致人员再次增加,1963年不得不进一步精简调整。

在干部制度方面,精简和教育是反对官僚主义的两大措施。1960年,百余万干部下放到基层。1961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轮训干部的决定,围绕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着重解决党的建设和党的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在反对干部特权和特殊化方面,取消高级干部副食品特需供应,要求政治第一,物质第二。^{[11](p.382-383)}针对违反企业管理和财政制度造成铺张浪费和贪污盗窃的问题,要求整顿财政纪律,严格财务管理,加强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严肃处理违法乱纪现象。

这阶段的反对官僚主义,主要针对工作失误和体制弊端,做出相应的改革和调整。期间提出的综合治理措施的案例,也是某个地方、某个部门的措施,没有上升到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缺乏顶层设计与地方实际相结合的工作机制。

(三)反对官僚主义与反对修正主义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又提上党和国家日程。在党和毛泽东看来,反对官僚主义,防止形成官僚特权阶层,是防止领导干部蜕化变质的重要方面。反对官僚主义要同反对特权阶层、打击贪污盗窃等违法犯罪结合起来。

1962年11月15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和全国党的监察工作会议,提出1963年各级监察机关的任务之一,是严肃处理清仓核资中揭发出来的重大案件,进一步向贪污盗窃行为作斗争,反对违反财经纪律的分散主义、严重官僚主义等错误行为。^{[12](p.303)}

为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执行“三五”计划,健全党的领导制度,改进思想作风,克服和防止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腐蚀,1963年3月1日,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简称“五反”)的运动。“五反”运动,“是又一次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13](p.150)}这样,反对官僚主义被纳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范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逐步向处理敌我矛盾的方式转变。1963年,把反对官僚主义纳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运动后期,转入专门反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两反”运动。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中写下批语,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否则,马克思主义的党将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国家将改变颜色。^{[13](pp.252-253)}5月2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召开负责干部会议,周恩来就反对官僚主义发表讲话,强调“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和“走上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12月13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14](p.348)}

1964年11月,陈正人在关于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的信中指出,部分老干部掌握政权以后,脱离群众监督,违反党的政策,官僚主义很严重,强调“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他认为:“一个巩固的社会主义企业建设的过程,只能是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过程,也是企业中的党和工人阶级不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过程。”克服企业管理部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又是促进这个过程的前提条件。毛泽东赞同这种意见,强调:“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他指出:“这些人已经是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15](pp.265-266)}1965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就批转王任重报来的九个材料,发出关于改进领导方法问题的指示,指出领导干部到基层单位蹲点,是领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方法,也是改变主

①“五多五少”: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

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16]p.286}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反对官僚主义,逐渐从抓违法乱纪,转变为反对官僚特权阶层和修正主义。

三、官僚主义的表现、危害和反官僚主义的性质

(一)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

官僚主义是根源于旧中国阶级、等级社会的复杂历史现象。旧社会中官僚主义的势力、习惯、风俗、思想,都会影响普通党员和干部。从革命到建设时期,党政军内官僚主义的表现有同有异,其共性,一般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当官做老爷。其主要表现是工作上的事务主义、行动中的命令主义、作风上的主观主义、地位上的等级主义和价值观念上的个人主义。

根据不同表现形式,周恩来把官僚主义概括为20种:(1)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2)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3)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4)老爷式的官僚主义;(5)不老实的官僚主义;(6)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7)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8)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9)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10)懒汉式的官僚主义;(11)机关式的官僚主义;(12)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13)特殊化的官僚主义;(14)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15)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16)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17)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18)宗派性的官僚主义;(19)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20)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1]pp.418-422}

其中第1、19种,属于违背党的理想、信念、宗旨方面的官僚主义;第2、3、5、6、7、8、9、10、12种,属于违背党的工作方式和作风方面的官僚主义;第4、13、14种,属于剥削阶级或者等级制方面的官僚主义;第11种,属于机构臃肿方面的官僚主义;第15、16种,属于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官僚主义;第17、18种,属于违背党的组织路线的官僚主义;第20种,属于违法乱纪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涉及违反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等各方面的建设,是违背党的性质、宗旨、作风、使命的剥削阶级特权在党内的反映。

(二)官僚主义的主要危害

一是脱离实际和群众,危害生产实践和群众利益。官僚主义的根本表现,是官僚主义者高高在上,不到基层组织调查研究,结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据1960年第一机械部报告,该部一年召开的全国性会议达328次,有的省的厅长在部里开会5个月。一年所发公文达13.5万件,出版刊物41种,内部简报89种,每月刊印总字数达600多万字,使干部忙于会议文件,有的造成严重泄密。^{[9]pp.286-287}如此文山会海,如何做好领导工作。

二是滋生贪污腐败,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损失。“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是造成制度混乱、浪费国家资财的重要原因,是滋长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温床。”^{[13]p.159}官

僚主义者不关心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们满足于臃肿重叠的机构,热衷于滥发报表文件,把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变成没有战斗力的官僚主义组织。他们是歪风邪气的“忠厚长者”,纵容损害社会主义事业;有的成为坏事坏人的包庇者和纵容者。有些甚至违法乱纪,欺压群众,走上危险的道路。这些现象都妨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

三是违背党的性质宗旨,危及党群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和政府权威。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是党的性质、宗旨的体现,是人民群众对党支持和拥护的体现。人民群众是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力量源泉。执政党应该自觉抵制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自觉把自己作为为群众谋取利益的工具,而不是把人民群众作为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如果执政党“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17]p.358}官僚主义和群众的矛盾和对立,妨碍发挥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严重的可能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

四是会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导致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反对官僚主义,许多内容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好,丧失党性和阶级性,也会走向党和国家的对立面。刘少奇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不关心基础,不为基础服务,反而伤害基础,就是官僚主义。总是搞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势必搞成人民和官僚主义集团的矛盾,直到这种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就要起来推翻这个上层建筑。”^{[18]pp.222-223}毛泽东也指出,大民主是用来对付阶级敌人的,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他警告“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17]p.326}

(三)反对官僚主义的性质

反对官僚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反对剥削阶级思想作风的斗争,是党政领导干部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教育的斗争。^{[9]p.298}从基本性质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反对官僚主义,是执政党自我净化、自我治理、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重要措施,是保持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要条件。

当“蜕化变质”或者“走上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者,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背离社会主义路线而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时,人民内部矛盾将转变为敌我矛盾。反对官僚主义与清除党内蜕化变质分子的性质有所不同。蜕化变质分子具有特定的思想和行为内涵。“凡是完全站在敌人的立场上,与敌人勾结起来,欺压群众,为非作歹的,或经不起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长期腐化堕落,屡教不改,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危害,堕落成为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应该定为蜕化变质分子。我们同蜕化变质分子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必须坚决将他们清洗出党。对于仅有腐化行为或犯有比较严重的违法乱纪错误的人或死官僚主义分子,不要定为蜕化变质分子。”^{[19]p.247}

四、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

就社会方位来说,社会主义制度不成熟不完善,是产生官僚主义的社会根源。新社会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制度中的某些环节还存在缺陷,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仍然存在,国家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就依然存在。党和国家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不同于旧社会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的政治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需要通过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这方面的官僚主义问题。

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缺乏,是产生官僚主义的自身原因。党执掌全国政权时间较短,党的领导制度不完善,党政机关的行政法规不健全,对各级机关的权限缺乏严格规定,致使各级机关处理事务缺少遵循的章程;依法行政、科学行政的制度远未完备。这导致下级机关忙于请示汇报,上级机关发布命令指示。这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工作机制根源。毛泽东总结产生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问题,认为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这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县、区、乡三级干部审查不到位的问题;这是尚未在整党中开展反命令主义和清除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的问题。^{[20]p.254}

中国长期的封建剥削制度,是滋长官僚主义的历史根源。周恩来指出:“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1]p.418}封建等级制和官本位意识在中国影响深远,一旦当官,容易骄傲自满、高高在上;夸大个人能力,忽视群众的作用;颠倒官员和人民的关系,不为人民服务,却要人民为自己服务;滥用权力,做违法乱纪的坏事;奉行“个人说了算”,不以平等态度待人,搞“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作风。“这些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都是历史上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留物,是妨碍党和广大群众联系的最大的敌人。”^[21]毛泽东指出:“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20]p.254}

小农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是滋长官僚主义的阶级根源。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科学文化和工业文明不发达,文化知识、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整体水平较低,导致有些领导干部容易从局部的、眼前的、孤立的角度看问题。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思想根源。官僚主义者,在思想方法上,是主观主义;在表现形式上,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他们奉行资产阶级形而上学,拒绝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他们对工作缺乏长远计划,常常“左”右摇摆,有时右倾保守,有时又急躁冒进。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辩证分析方法,只研究成绩,不研究缺点错误;只满足表面成绩,不

讲究实际效果;只追求数量,不讲求质量;只限于狭隘世界,无视整体全局。毛泽东指出:“在很多部门中极端缺乏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状况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这是官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原因。”^{[22]p.69}

中国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机构设置尚不完备,制度构建缺乏经验,干部素质参差不齐、教育科学文化水平落后等都会制约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的进程,难免产生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新旧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因素合力影响的结果。

五、反对官僚主义的主要举措和经验教训

(一)反对官僚主义的主要措施

找准病根才能对症下药。根据中共八大到“文化大革命”前党反对官僚主义的历程,从整体上说,有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民主监督;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精简国家机构编制;加强对违法乱纪行为的检查;加强理论学习,拧紧思想阀门等举措,积累了诸多有效方法和经验。

1.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官僚主义主要是违背党的优良传统的结果。对此,应该通过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贯彻群众路线,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宗派主义。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党和毛泽东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发扬民主集中制,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等,目的是要领导干部不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是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的“最重要最有效的一项措施”。1956年至1966年,党和毛泽东始终强调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是否参加生产劳动,成为考验干部有没有无产阶级革命作风的试金石。干部只有参加生产劳动,才能深入群众生活,发现问题、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学习群众经验和智慧,完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树立经济权威、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领导群众前进。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是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消除命令主义,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人民公仆变为民主主人的一项制度。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才能使“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13]p.254}这是保持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重要举措。

2.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反对各种错误观念

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是领导干部沾染个人主义、产生官僚主义的思想来源。对此,中共中央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作为防止官僚主义的思想堤坝。毛泽东强调,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强调坚

持无产阶级世界观,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坚持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强调重视物质利益奖励机制,更注重精神荣誉教育机制。邓小平提出:整风整什么?整作风,整制度,整队伍。整风主要是整领导,先把领导层搞正了。整风不能主要去整基层干部。所谓整领导,一是思想作风的整改,一是切实关心群众生活,彻底打掉官僚主义。^{[2](pp.84-85,86)}

反对官僚主义,领导干部要加强修养。周恩来提出,领导干部要过“五关”。“过思想关”,就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过政治关”,最重要的是坚持革命的立场问题。“过社会关”,就是承担改造落后社会的任务,不能让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势力改造自己。“过亲属关”,就是领导干部不能培养一批老爷和少爷。“过生活关”,就是坚持艰苦朴素的美德。^{[1](pp.423-428)}

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反对其他相关错误思想。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都有密切关系。据北京市财贸办公室调查,骄傲自满、本位主义、官僚主义和单纯商业观点,互相影响,互相滋养,互相助长,形成一股歪风。本位主义、官僚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商业作风的护身符。本位主义,片面地强调本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官僚主义,则对歪风邪气熟视无睹。骄傲自满情绪,则缺乏共产主义的雄心壮志。如果不克服思想作风方面的毛病,就不能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甚至有使社会主义企业变成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23](pp.165-166)}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反对这些错误思想。

3. 建立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坚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度基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高指标、高征购,导致一些地方分散主义严重;这些现象又反过来又助长命令主义和个人独断专横现象。以七千人大会为契机,党中央大力倡导民主集中制,强调“越是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越是要反对官僚主义”,力求使方针、政策、经济计划、规章制度和具体措施,都尽可能合乎实际。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讲话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意义、目标;党内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反对分散主义和命令主义;坚持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当好班长,学做乐队指挥等。邓小平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凡是违反这个制度的,都要纠正过来。”^{[5](pp.165-166)}

建立严格的政治工作制度和组织工作制度,是防止官僚主义的有效经验。1960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在检查“五多”情况中,结合“三反”运动,在农村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和组织工作制度;党员、干部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各项方针政策;建立和健全基层党组织和公社的民主生活制度,公社的党组织要坚持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制;对公社、管理区、生产队三级组织的干部,实行轮流调换的制度;县委机关每年至少必须有八个月的

时间下乡流动办公;干部必须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关心群众生活,认真执行省委所规定的口粮标准;坚决贯彻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严禁铺张浪费;坚决贯彻劳逸结合原则,保证社员适当的休息时间;干部必须遵守省委颁发的干部公约,严肃革命法纪,严禁扣饭、捆人、吊人、打人、罚款、没收社员财物等违法乱纪行为;认真控制会议和文件表报。^{[9](pp.483-488)}健全基层党的组织生活,把领导干部的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是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重要举措。

4. 精简党和国家机构

精简机构,提高效率,是反对官僚主义的制度保障。截至1961年6月,中央各部门在京单位的24万余人,精简了8万余人,占原有人数的33%。其中,行政部门6.4万余人,精简了1.5万余人,占原有人数的24%;事业单位17.6万余人,精简了6.5万余人,占原有人数的37%。各部门实际情况不同,精简的比例也有高有低。农林口精简了48%,工业交通口精简了37%,外事口精简了8.5%。在机构方面,中央各部门的司局机构,撤销、合并了89个,精简了15%。事业机构并了111个,精简了26%。^{[24](pp.173-174)}经过精简,初步改变了“五多五少”现象,提高了工作效率,加强了基层力量,纯洁了组织,减少了泄密和政治事故。

5. 将思想教育、行政处罚、纪律处分和法律制裁相结合

根据过错或者罪过的不同程度,给予相应的惩罚,是防止和遏制官僚主义的必要措施。对犯官僚主义错误或者罪过的处理,基本包括批评教育、行政处罚、党纪处分和法律制裁等。在“五反”运动中,党的指导方针是:敌我问题从严,人民内部问题从宽;在人民内部问题中,批评自我批评从严,党纪、政纪、法律处分要分别情况,酌量从宽,严肃与谨慎相结合。

对于“五反”运动中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中央监察委员会根据情节轻重,提出不同处理标准:(1)非法所得在三百元以下,能够检讨、退赃的,不予行政、党纪处分;个别情节严重,拒不检讨、拒不退赃的,给予适当的行政、党纪处分。(2)非法所得在三百元以上、千元以下,积极退赃,可以减轻或者免于行政、党纪处分;坦白、退赃不好的,给予应得的行政、党纪处分;个别情节严重,拒不坦白、拒不退赃的,应当加重处分,依法制裁。(3)非法所得在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能自动坦白,彻底退赃,可以免于刑事处分;表现特别好的,也可以减轻或免于行政处分;坦白、退赃不好的,应当给予刑事处分;拒不坦白、拒不退赃的,必须从严惩办。共产党员非法所得在千元以上的,一般应当开除党籍,个别表现特别好的,也可以不开除党籍。(4)非法所得在五千元以上,能自动坦白,彻底退赃,可以减轻刑事处分;表现特别好的,也可以免于刑事处分,不开除公职。坦白、退赃不好的,可以从重给以刑事处分。共产党员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非法所得在五千元以上的,一律开除党籍。^{[23](pp.7-8)}可以看出,根据轻重和情节不同,可做

出行政、党纪、刑事处分。

在“两反”运动中,据1800多个单位统计,参加运动的41万人,清查出15100多名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3.3%。其中,300元以下的,占2.89%,占犯错误总人数的79.58%;3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占总人数的0.56%,占犯错误总人数的15.39%;1000元以上的,占总人数的0.18%,占犯错误总人数的4.95%。^{[23](p.6)}

(二)反对官僚主义的主要教训

应该抓住主要矛盾,提出主要对策,不应避重就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主要错误,在于超越阶段和“五风”泛滥。应该从实际出发,估计农业发展、钢铁产量,根据客观规律发布行政命令,而不能人为地推动所有制的升级。然而,反对官僚主义的重点,却在“五多五少”。这使得反对官僚主义,变成形式主义。

根据主题变化,转变执政方式。反对官僚主义,改进党执政的方式,应该依靠改革领导制度和工作机制,不应主要依靠政治运动。思想作风问题,会随着经济关系和政治权力的变动而变动。反对官僚主义,不应只注重思想作风问题,还应注重制度建设。制定比较完备的党规、党纪、国法,依照党纪国法惩治过错或者罪过,更具有长效机制。邓小平指出:“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25)(p.328)}

惩治犯罪主要依靠法治,不能仅依靠政策。中国缺乏法治传统,法制建设不健全。在定标准、定责任、定处分的问题上,更多采取政策而不是依据法律。“两反”运动期间,中央监察委员会按照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根据违法犯罪的情节轻重,划分为300元以下、300至1000元、1000元至5000元、5000元以上几类,并根据悔改表现,对领导干部做出行政处分、党纪处理、开除党籍、刑事惩罚等。但三类和四类的划分标准相对模糊,操作不易。

根据情节轻重确定划分标准和处理方式,不应笼统、模糊。关于官僚主义的判定,需要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做到行为主体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反官僚主义措施的层次较多,难以确定错、罪程度及其相应的惩治方式。比如,1961年8月14日,中央监察委员会把堕落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定性为蜕化变质分子;把有“比较严重的违法乱纪错误”,而又“屡教不改的分子”,定为“死官僚主义”。定性“死官僚主义”者,易混同于“蜕化变质分子”。再如,《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基层党组织的第7项任务,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和消除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同一切违法乱纪、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进行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针对一般性的错误,适合人民内部矛盾;而同违法行为的斗争,主要针对犯罪问题,属于敌我矛盾,也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因此,需要根据情节轻重及其后果,把不同性质的官僚主义标准具体化和制度化,使其判定和处理,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应该根据实情划清两类矛盾、三种性质,不应轻率上纲上线。严格区分行政错误、刑事犯罪和敌我矛盾三种层次性质的界限。反对官僚主义,注意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的区别,注意一般错误同违反党纪国法的区别,注意行政处分同打击犯罪的区别。加强党的思想工作、纪律建设、行政立法、刑事立法建设,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理可说、有章可循、有纪可守、有法可依。遗憾的是,由于缺乏法制传统,法制建设不健全,在群众运动中容易做简单的政治处理,把涉及违背社会主义价值和利益原则的违法乱纪行为,上升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反对官僚主义是执政党长期的历史任务。1956年至1966年的反对官僚主义,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一种有益探索,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和教训。不成熟的理论同不成熟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经验和教训,都是推进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财富。

【参考文献】

- [1]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2]邓小平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5]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5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7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4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9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5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2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7]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1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8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0]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1]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N].人民日报,1964-08-03.
-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 [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5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7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美 景

essence of Marxist justice theories, eliminating related misconceptions and confusion. Marx didn't generally reject justice or deny justice itself. "The vacancy of justice" never exists in Marx's ideology. Marx's thoughts on justice was expanded through capitalism criticism and human liberalization. On the one hand, he dedicatedly criticized the capitalist lie of "the permanent justice of capitalism", invalidating the abstract discourse of "capitalist justice"; on the other hand, he dialectically built up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justice on the basis of a proletariat stance and practical working. Therefore, labor justice constitutes the kernel and fundamental appeal of Marxist justice ideology. (Mao Le-tang)

From Labor to Justice: The Evolution of Marxist Justice Theories: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laid multi-level and multi-dimension studies on Marxist justice theories. However, they failed to uncover the necessity of labor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justice. Marx elaborated jus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indicating that labor is the essence of human beings, and that the constant pursuit of justice lies in realizing the essence. Proceeding from the concept of labor as his core idea, Marx explored justice, regarded working as a standard against which one's deserved earnings are measured, and criticized the injustice of capitalism from the angle of the employment and exploitation when laborers are forced or misled. He then put forward "free labor", the ultimate goal of freedom, illuminated that the way to justice is through the emancipation from alienated labor to free labor, and suggest that justice transcended itself upon the termination of alienated labor. Marx's deducing justice theories through labor is conducive to the achievement of social justice and fairness. (Zhao Yun-wei)

On Mao Zedong's "Great Policy of Benevolence": A Review of the Marked Features of CPC's Administration: In the times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Mao conceived the thought on CPC's "Great Policy of Benevolence", advocating that CPC shall stick to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and implement the great policy to protect people's long-term interests on the basis of integrating their current and long-term interests. Mao's thought on "Great Policy of Benevolence" upholds and enriches Marxist governing theories, providing a reward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governing Party. The history of CPC's administration demonstrates that "Great Policy of Benevolence" has been comprehensively put into practice in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become a marked trait of CPC's administration. (Liang Bao-wei)

The Wisdom and Power of CPC's Persisting in Its Original Motivet: To achieve communism is the CPC's original motive, while the CPC holds to the conviction that original motive shall never been forgotten before they accomplish the goal. However, the current fall and decline in revolutionary spirit might give rise to CPC's fading original motive. A proletarian party deprived of revolutionary spirit would never dedicate themselves to communism, needless to say persisting in its original motive. The tenet of "sticking to the original motive and heading forward" propos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s not only an inspiration to all party members, but also a powerful driving force which motivates all of them to keep moving ahead. The tenet spurs and streamlines Party members' behavior in the spirit of tough love, and imposes a impelling force on Party's self-reflection. "Sticking to the original motive and continually moving forward" facilitat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to various CPC's undertakings, demonstrating its unleashed power and wisdom. (Zhang Zhong-min and Tan Zhi-kun)

A Review of CPC's Ideology of Anti-Bureaucratism Between 1956 and 1966: Anti-bureaucratism serves as a crucial part of governing party construction. Bureaucratism is characterized with divorcing from the masses, the reality, and the community, being superior officials, and violating mass line, ideological line and organizational line. Bureaucratism impairs the interests of the masses,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PC, the undertaking of the country, and the prospect of the nation. It reflects the ideology of the exploiting classes in Party cadres, and runs counter to the essence, tenets and mission of the CPC. To combat bureaucratism, we should rectify and modify the institution of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CPC, launch a reform of party and governmental system, enhanc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arty inspection, strengthen education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and carry forward refined customs and traditions of the CPC. Due to the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for the CPC's administration and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experience of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olitics, anti-bureaucratism is also confined to its limits such as emphasizing campaign, education, policy and comprehensive issues while understating mechanism, institutions, legalization and standards. Anti-bureaucratism is an effective attempt at safeguarding the Party essence and stick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arty governance by itself, offer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promoting the rule of governing the Party by strict rules. (Liu Cang)

On the Pathway of Promoting the Socialist Global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trend of global discourse entails its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The accomplishments of China's pathway make it possible for the socialist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take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discourse. Actively promoting the involvement of the socialist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governance lays a foundation for elevating the socialist global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nhances the worldwide influence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Xu Xu-qi and Meng Xin)

On Promoting the Discourse Dissemination of the Socialist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undertak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motes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tinual development of its theoretical discourse. It poses requirements not only for the thoughts on the structure, function, configuration and developmental logic of theoretical discourse, but also for the socialist innovation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discourse dissemination. Since the socialist discourse unifies both external form and internal connot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its theoretical dissemination shall not only focus on discourse connotations, follow up the inner logic of discourse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history, practice and theory, but als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multiparty coordination throughout the dissemination. Only in this way could we lay a solid ideological and operational foundation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theoretical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and enhancing our theoretical confidence. (Xu Rong)

An Analysis of Two Trends in the Theoretical Studies of Marxism: Current theoretical researches on Marxism witness two trends: one focuses on static textual theories, highlighting their value orientation; the other deals with dynamic social realities, emphasizing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Marxism. The trends lead to an in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gic of value and that of experience in Marxist studies, which suggests the absence of entities on both sides. Hence, we shall hold the unification of value and experience, promoting the robus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Xu Cen-chen)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1917: A Canonical Example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1917 is not only a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Marxism but a practical innovation in Marxist proletariat revolution and autonomy. During the Revolution, Lenin unveiled a new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summarized the phased features of monopoly capitalism, analyzed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among those features, uncovered the principle of the unbalance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imperialism, and made the claim that socialism might attain its realization first in one country. The victo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ransformed socialism from dream to reality, elevated Marxism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and opened up a new epoch in human history. (Zhu Bing-yuan)

(翻译:张剑锋)